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评《中国目录学史》

傅立宏

1992年6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乔好勤先生积10年之功力撰成的专著《中国目录学史》。该书不仅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还引起了港台出版发行界有关人士的重视。乔著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社会效应?我们不妨从其理论和方法上的成就与特色方面来寻找答案。

通读全书,发现乔著的第一个特色是创造性的见解和真知灼见颇多。该书善于在指出前人失误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譬如,过去人们常根据《隋志》的一些评述,如“世相祖述,无所变革”等,就断定魏晋南北朝目录学“发展缓慢”,处于低谷。乔著不为成见所囿,大胆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目类型、书目体例、书目分类都有所创新和变革,目录学思想也极其活跃,它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又如,有人因《众经别录》残卷尚存而将其称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最古佛经目录。乔著认为今存我国最古的佛经目录应为《出三藏记集》,因为《众经别录》流传至今的残卷只是其很少一部分。再如,有人批评姚名达的《目录学》一书“以粗浅图书馆编目原理,而名之曰目录学,实离题太远”,但乔著认为姚著敢于“破除传统门户之见,融古今中外于一体,扩大了目录学的知识领域和内容,既不爱古薄今,又不割断历史,代表了30年代中国目录学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新’的方向。”

内容丰满而充实,这是乔著的第二个特色。掩卷细思,觉得书中确有丰富的养分可供吸收,书中蕴藏着不少实实在在的东西。从反映历史的时间跨度来看,自典籍的产生与目录的起源直至当代目录学的发展,上下数千年,均在作者的梳理之列。尤其是辟专章对当代目录学史进行研究,填补了中国目录学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从所撷取的目录学家数目来看,光重点目录学家就有刘向、刘歆、班固、郑樵、章学诚、梁启超等30多位。从所述评的书目和目录学专著数来看,仅重点目录和核心专著就达70多部,如《七略》、《汉书·艺文志》、《七志》、《崇文总目》、《四库全书总目》、《通志·校雠略》以及《校雠通义》等。从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来看,既分析了不同时代的各类书目工作实践活动,又总结了其理论研究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宫廷藏书目录、史志目录、私藏目录、专科专题目录、书业书目、推荐书目、馆藏目录等多种类型目录的源流、编撰过程、体例及其所蕴含的目录学思想内核进行了透彻地辨析,使全书显得有血有肉。

始终以阐述目录学思想为依归,这是乔著的第三个特色。首先,乔著在简要叙述某一目录学家生平书目工作事迹与成就后,最终往往将落脚点置于其目录学思想的剖析上面。如作者先简单地提及王俭的为官生涯以及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的造诣,然后具体说明其研究目录学的结晶——《七志》的体例和分类体系,最后从“刘氏目录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类名的改变”、“类目的增加”、“书目提要新体例的开创”等方面阐述了王俭的目录学思想。其次,乔著常常将一个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与其所撰书目的体例和分类体系方面的特点交织在一起论述,但多是前者统领后者,后者服务于前者。如乔著对《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七志》、《七录》、《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四库全书总目》等一大批书目的处理即是如此。最后,乔著往往先把触角伸向一个时代书目实践活动的各个领域,然后再总结该时代的目录学思想。如乔著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章第四节、第三章第五节、第四章第六节、第五章第七节、第六章第六节、第七章第六节、第八章第八节、第九章第五节,均是对各章所述时代目录学思想的归纳和总结。

可见,乔著时刻不忘紧扣各个时代的目录学思想。目录学思想好似一根“金线”,它灵巧地将一盘“珍

珠”——《中国目录学史》的全部材料贯穿起来，不仅使全书成为一条珍贵的“项链”，而且使它臻于“形散而神不散”之境。

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这是乔著的第四个特色。乔著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两种具体方法的运用。一是“纵横溯源法”。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系统论思想为武器，密切联系每一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科技背景，惯于从政治制度史、经济史、文化史、学术史的层面上深入开掘，把目录学的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力求从中寻找出一代目录学兴衰的深刻社会历史根源。首先，我们可以从乔著的部分节名中窥见到这一特点。如“汉代文化与目录工作”、“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与目录工作的变革”、“清代的考据学与目录学”等等。其次，我们可以从文章的章首语中洞悉。最后，我们可以从具体论证过程中领悟到。例如，乔著先从经学的兴衰、史学的繁荣、文学的蓬勃、佛道的崛起、科技的辉煌等视角剪辑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历史画面，然后寻觅当时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的发展轨迹，推演出“经学的崇高地位导致当时书目中儒家经典冠于群书之首”、“文学的兴起和文集的发展导致文学专科学术目录的产生和综合目录中集部的形成”、“造纸术的提高导致纸的普遍应用，进而又导致私人藏书和编目的普及以及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研究的社会化”等科学结论。二是“承前启后法”。凡是有争议的问题，作者往往先陈述已有的各种观点，然后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譬如，关于目录的结构，作者先分析了《目录学概论》的“四要素”说和余嘉锡的“目录体制”说，然后从目录的本质特征出发，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书目的结构应指书目的内在形式，即由书目款目和编排系统组成的一种书目结构链。”

写作手法灵活多变，这是乔著的第五个特色。以下几种手法在乔著中运用得十分出色：一是旁征博引法。纵览全书，发现乔著共引原文 586 次，共参考原著 60 部。此外，作者也不忘适时地利用考古发掘的成果为佐证。例如，作者在阐述“夏代文字有较大的发展”和“甲骨文献的排列是有序的”等论点时即是如此。二是“史传结合法”。乔著在阐述某一目录学家的思想与成就之前，往往要先为此人作一小传。作者可能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每一目录学家的成就都与其生活背景、成长道路有密切的关系。第二，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与其政治主张不可分割。例如，梁启超政治上鼓吹改良主义，其《西学书目表》的分类体系即以改良主义为思想基础。第三，便于读者全面地了解一个目录学家。例如，读者看过乔著第 381~383 页的内容后，可能会产生如此感想，叶德辉的才可钦，但其德可鄙。三是“点面结合法”。乔著在综论一代之目录学思想时，往往既有“全景式”的宏观扫描，又有“聚焦式”的剖析透视，较好地做到了点面的水乳交融，例如在第八章第八节中，作者先高度用精炼的语言简要地对近现代目录学思想的发展水平作了概括，然后重点对姚振宗、叶德辉、蒋伯潜、余嘉锡、杜定友、姚名达等 6 人的目录学思想作了具体分析，有效地避免了空洞无物之弊。

从总体上看，乔著是一部具有筚路蓝缕之功的史著，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部十分完美的作品。它还存在着一些瑕疵，如检索途径单一，对当代一批著名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缺乏系统分析和总结，没有预测中国目录学史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等等。但从其主要成就和学术水平来看，它已超过了现有其它任何一部目录学史著作。乔著充分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又不囿于前人的成果，因此不愧为是一部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责任编辑 江 平)